

鼓浪屿的美丽与哀愁

本报记者 程竹 杨晓华/文 卢旭/图



鼓浪屿，是一座美丽而又让人神往的小岛。她的迷人风韵，如同陈年的美酒般令人陶醉。阳光在古老的榕树藤上跳跃和流淌，波涛拍打着巨大的礁石，不断把海上的清风护送给南国芳草。从自然中撷取石料的别墅，像一座座仙境中的迷宫，若隐若现……俨然一座巧夺天工的“海上花园”。

“花园”之美，更在人文。近现代以来，先后有18个国家在此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立领事馆，欧陆风情、南洋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建筑风格迥异，却又和谐共存。林语堂、林语堂、马约翰、殷承宗等文化名人的印记使这个岛屿散发着斑斓的梦想，流淌着心灵的琴声。这里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是以闽南文化传统为底色对风云变幻时代多元文化的大胆容纳。

鼓浪屿，本应让人们在海风和涛声的交织中，去领略那自然与人文的神韵。然而当你伫立于此，心灵的恬静却会不断被擦肩接踵的人群和此起彼伏的商业吆喝声所打断。就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记者还听到了当地诸多原住民不约而同的抱怨：鼓浪屿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鼓浪屿。全民旅游的时代，使得这里已经不堪重负。

海上花园的斑驳伤痕

位于鹿礁路1号的博爱医院，曾经是日本人在厦门开办的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医院。典型的日式风格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但今天的博爱医院，却是“鹤立鸡群”地坐落于众多不协调建筑物之中。

8月2日，记者来到人们常提起的林巧稚故居前。在这栋拥有100多年历史、被网友们爱称为“小白宫”的建筑门前竟有3个煎烤摊。而院子本身如今竟是数十名环卫工人休息的居所，窗户用木板纵横交错地钉上，五颜六色的旧衣物随风飘摇，后院里更是径直堆放着各样的垃圾。

随处可见的家庭旅馆，把许多老建筑的模样和结构已然改变得面目全非。本已狭窄的街道两旁，餐饮、干果、工艺品店摊位林立，散乱地延伸到街面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依然有增无减。记者乘坐的渡轮分上下两层，却是人满为患，船体稍有颠簸，人群便拥塞不通。无论最后是满足还是失望，人们都会慕名而来。

这些年，鼓浪屿把美丽分享给世人的同时自身也元气大伤。曾经在鼓浪屿生活了数十年的厦门文史学者何丙仲慨叹道：“太多老朋友不堪器扰，都搬走了，岛上已经没有人可以心平气和地

坐下来，一起聊天、喝茶，谈天论地，消磨时光了。”

何丙仲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感受。数据显示，1940年，岛上有4万华人。但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户籍居民6800人，空挂户7100人。而这6800位原住民依然在流失。原住民是鼓浪屿社会和文化生态的主要承担者、维护者和创造者，原住民的大量流失，使得鼓浪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文化的根与魂。

忧愁何来？

事实上，居民的大量外迁不单是受商业侵蚀所致。早在1941年日本人控制鼓浪屿的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于此岛居住的华侨们就曾两次携资和人才离岛。在“上山下乡”初期，岛上居民达3万多，超3000名文化青年受时代氛围的感染离岛下乡，返回者极少。改革开放后，厦门出现单位建房，部分岛上居民出于摆脱卫生设施缺乏之苦陆续迁离。

但何丙仲认为，导致人员外迁的根本因素是政策变化。改革开放后，厦门市因旅游区定位所致而出台了两个关键政策：一是外迁鼓浪屿岛上的工厂；二是1993年初出台《厦门市城市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按“只准出、不准进”原则严控鼓浪屿人口。

从1994年起至2000年，厦门市斥资5亿元，将岛上造船厂（鼓浪屿车间）、灯泡厂、玻璃厂和三塑厂陆续搬迁。随着就医人数锐减，1997年，厦门第二医院部分搬迁至岛外。同一时间，岛上的厦门二中高中部于2008年8月迁出，带走近1500名学生。2009年以来，岛上的厦门演艺职业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分校、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陆续迁离。学校和医院的搬迁，被何丙仲等专家称为“釜底抽薪”，使得原住民不得不陆续迁离。

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郑启五表示，工厂外迁几年后，给鼓浪屿带来相当大的伤害。鼓浪屿人口出生率为厦门各区最低，最早出现人口零增长。

与搬迁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汹涌而来的旅游潮。据鼓浪屿管委会工作人员测算，鼓浪屿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可供游客游览的空间只有0.6平方公里，能够容纳2万人较为舒适的感觉和游客。但事实上在节假日旅游高峰期，岛上游客经常超过10万人次，最多的一天曾达到过12.38万人次。旅游潮的到来导致外来务工人员迅速增加至7300人，已超过岛上的户籍居民。

大量游客的到来为小岛提供了空前的商机。2006年4月，为了弥补鼓

浪屿宾馆的有限容量，为更多游客提供过夜消费的可能，厦门市决定加快岛上的家庭旅馆建设。随后，德国领事馆首当其冲被改造为家庭旅馆，岛上的152栋老别墅紧随其后。时光流转，岛上的家庭旅馆从2008年的10多家迅速膨胀到了目前的400多家。起初，家庭旅馆被认为是充分利用闲置住房产生经济效益。事实上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改建浪潮中有1/3的原生态建筑都因“不规范、欠缺条件”的改造而惨遭破坏。部分没有取得合法经营权的私人旅馆甚至将老建筑的色调从“红砖、灰墙”改变为“红黄、翠绿”，老建筑的历史风韵已然难觅踪影。

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将鼓浪屿当做养家糊口的经济支柱所在，他们为了讨生活，很难去长远地考虑鼓浪屿需要维护什么，发展什么。倒是务工人员与景区管理方不断的摩擦和冲突这几年时不时地会引起外界关注，甚至有限。

在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曹放看来，鼓浪屿景区管理和社区管理的二元体制，是导致诸多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2005年1月31日，厦门市政府出台了《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名胜管理办法》，其中规定：设在鼓浪屿风景名胜区内的所有单位，除了各自业务受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外，都必须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规划管理。而鼓浪屿居民社区的建设管理，却是隶属思明区政府的派出机构鼓浪屿街道办。

申遗，缓慢的脚步

“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是为了吸引游

客而申遗，而鼓浪屿申遗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理念，更好地传承其文化内涵。”曹放说。

2008年，鼓浪屿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4年多来，在国家文物局、福建省委、省政府、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及省文物主管部门的直接指导下，鼓浪屿的申遗工作扎实推进，并已成功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然而，从2008年到今天，鼓浪屿申遗的脚步和她的知名度相比依然显得迟滞和缓慢。在曹放看来，如果不破解现存的主要矛盾，即便是申遗成功，鼓浪屿仍要面临保护环境。“鼓浪屿要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和特色，急需解决3个矛盾，即文化保护与旅游需求的矛盾、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及旅游景区与社区的矛盾。”曹放说。

作为名胜古迹，鼓浪屿自然属于全民的公共文化资源，但这座小岛所能承载的物理容量着实有限。据管理方科学估算，每年接待游客400万人次，是最佳的承载力，事实上，去年的实际数量是1136.66万人次，几近3倍。2008年，福州到厦门之间动车的开通带来了客流量的猛增。有关专家普遍认为，今年底深圳到厦门的动车即将开通，游客量必将再度攀升。目前，鼓浪屿通过开通市民专用通道、前移厦鼓轮渡售票窗口、启用鼓浪屿内厝码头、扩建鼓浪屿轮渡码头和三丘田码头、建设完善的预警应急系统等措施，改善疏运设施，有效地缓解了游客压力。但形势依然严峻。

文化遗产保护是景区长远发展的基础，然而商业化的开发和利用，一时却

也难以终结。如何在这种背景下，确保文化遗产的安全和自然人文环境完整？目前，鼓浪屿为准备申遗，强化了一系列的综合整治行动，其中涉及鼓浪屿别墅码头等10多个必须拆除的建筑物与构筑物，600多个占道经营摊点，200多个无证导游，188个无证家庭旅馆和餐馆，140余个公房转租或公有住房改个人商业用房。

景区与社区的矛盾，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涉及文化发展、市场繁荣和民生保障的复合性问题。目前从管理体制上，鼓浪屿正在提请市委、市政府按照国家相关条例规定和现实要求，研究建立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但当地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即使上级部门全力推动

这一体制的建立，恐怕很难在短期收到明显效果。

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帮扶和推动下，鼓浪屿正在从更宽广的视野与更全方位的视角来认识其自身的申遗行为。这一切正如曹放所言：“当前，我们已经明确了53个申遗核心要素点，被评定为历史风貌建筑的老房子达391幢。具有保护价值的老街老巷作为鼓浪屿文化遗产的展示窗口必须做到‘应保尽保’，现有路网结构也不能轻易改变，它们承载着鼓浪屿的生命信息和遗传密码。对鼓浪屿申遗而言，最难的工程其实是鼓浪屿文化气质的恢复，而这也是鼓浪屿向世界文化遗产迈进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前往鼓浪屿的游客在拥挤的渡轮中，脸上充满期待。



鼓浪屿的原住民小贩与外来游客，谁看谁都是风景。



鼓浪屿的欧陆风情与艺术气息吸引青年男女在此拍摄婚纱照。

泸县有件新鲜事：农民演艺央视开演

肖鹏 曾依然 本报驻四川记者 王雪娟

“不走进泸县的农村演出市场，你就无法体会到其巨大潜力。不走近泸县的每一个农民演艺团队，你就无法体会到这些草根艺人的朴实、坚韧和执着。”这是来自于泸县农民演艺网蹲点日记中的一句话。7月16日上午，“走基层·泸县农民演艺网蹲点日记”在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正式与全国观众见面。

缘起《中国文化报》

3月19日，《中国文化报》头版刊发《农民歌舞团唱红大西南》一文，随后被新华网、人民网等多家网站转载，引起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注意。4月初，刚在北川县做完节目的央视记者张洁一行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泸县先行踩点了解。在3天的时间里，张洁深入宏亮歌舞团、心连心文工团等农民歌曲团队，了解他们平时的排练、演出生活，并观看了农民演艺网宣传片和农民演艺活动专题片，听取当地文化部门负责人介绍的相关情况。“演员们倾情的表演和观众们高涨的热情特别感染我，让我很有创作的欲望。”张洁表示。

泸县农村历来就有在婚嫁嫁娶、红白喜事上请一些能歌善舞的人来吹吹打打热闹一番的习俗。2009年，泸

县文体广电局把散落在川南各地的86支农民演艺团体整合到一起，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民演艺中心——四川龙城农民演艺中心，逐步形成了“县有演艺中心、镇有演艺站、村有服务点”的演艺网络。2011年5月，“泸县农民演艺网”成功入围首批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经过两年的创建，泸县农民演艺团队已经壮大到97支，演员人数扩大到3000余人，年演出1.6万多场次，2012年演出收入达8000多万元，演出范围遍及川、滇、黔、渝等地，观众达2000多万人次，唱红了大西南。

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经过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等各大媒体报道后，已经在全国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今年春天，火爆的泸县农民演艺再次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

其实央视对泸县农民演艺的报道

并非第一次。早在2011年，央视农业军事频道就曾经在《聚焦三农》栏目中做过一期泸县农民演艺专题。不过和上次相比，这次报道无论在报道时长、深入程度还是全面性上，都有了极大的飞跃。

采访中的感动

“这个百岁老人祝寿演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得去拍一下。”当发现红长歌舞团近期将到合江县榕山镇举办一场百岁老人祝寿演出时，央视记者张洁顿时产生了采访兴趣，顾不上榕山镇路途遥远，她毅然决定将这场演出列为必拍对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6天的拍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摄像师的专业精神也给当地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每一个细节的“斤斤计较”，换来了后期精良的画面。“我们

要做的就是尽全力配合央视的采访和拍摄，做好后勤保障。”泸县文体广电局局长游书勇表示。

尽管只安排了6天的行程，实际的采访和拍摄却用了整整8天。在8天的采访中，央视记者深入到宏亮歌舞团、心连心文工团采访拍摄演员们平时的排练生活；跟踪心连心文工团、长红歌舞团到合江县李市镇、合江县榕山镇等地拍摄团队演出场景；拍摄政府举办的培训、公益演出等；着重采访了部分团队负责人、县文体广电局负责人。并在这一过程中挖掘出了陶玉鸿、金豹、苟峰等人的感人故事。

从“中国梦——和谐美丽泸县”公益巡演团队选拔赛中发掘陶玉鸿纯属意外。陶玉鸿的团队在选拔赛中意外进入前十，获得演出资格，但是由于没有演出许可证他们在赛后被举报。后经农民演艺协会主要成员协商，最终

保留了他的演出资格。“我一开始还以为大家都会抱团反对陶玉鸿，取消他的演出资格，没想到他们说这么让我感动的话。”张洁说。

在采访之前，张洁曾以为泸县农村在生日寿辰上请演出，也许更多的是源于相互攀比，但在深入了解后发现，他们几乎在每场演出的背后，都有着感人的亲情故事：有着外出打工的人们对家乡亲人的感激和惦念，有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也成为泸县农民演艺得以迅猛发展的深厚文化土壤。”张洁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采访、拍摄的整个过程以及最后播出的节目来看，央视记者最关注的是农民演艺团队、演艺人员的生存现状以及政府对农民演艺的培育、扶持情况，并试图从中挖掘出农民演艺得以发展、繁荣的深层次原因，找到农

民演艺这一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对当下繁荣农村居民文化生活、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借鉴意义。“这是我在全国这么多地方从来都没见过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我认为农民演艺的模式也是值得在全国推广的。”采访结束后，张洁感慨。

“蹲点日记”呈现文化奇迹

经过近两个月的精心制作，“走基层·泸县农民演艺网蹲点日记”终于在7月16日的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

“走基层·泸县农民演艺网蹲点日记”总时长达40多分钟。片子中，央视记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全新的观点，对“泸县农民演艺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深层次宣传报道，生动展现了泸县农民演艺团队、演艺人员的生存现状，深刻阐述了泸县农民演艺发展、繁荣的原因，向全国亿万观众呈现了发生在泸县1500多平方公里和广袤西南大地上的“文化奇迹”。

这一系列报道不仅大大提升了“泸县农民演艺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利于泸县农民演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更是树立了泸县在全国的良好形象。